

的奖补与保护草原生态两张皮的现象。

7、纠正将草原畜牧业等同于农区畜牧业的经济思路偏颇。在草权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探索以社区为主导的放牧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瞄准国内国际有机畜产品高端市场，积极扶持牧民发展高效生态畜牧业及相关加工业，为稳定增加牧民收入提供政策保障体系。

8、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先导，促进政府各部门对草原牧区项目设计、项目运作模式的改进。建议各级政府从草原牧区的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更好地担负起服务与监管的责任。实施规划要在充分考察、论证的基础上，科学划定生态功能保护区的具体范围，明确生态功能保护区的主要建设任务、重点项目和投资需求。要积极争取将实施规划的主要内容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策略。至于牧区项目的设计实施，应该遵循自下而上，后自上而下，反复磋商的原则，在核实、比较、评估之后再加以确定，有效克服项目设计和实施中的盲目性、非科学性、非合理性等弊端。

9、积极推进与草原牧区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压缩机构，减少人员，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减轻牧区环境与发展的压力。同时要尽快实现牧区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逐步建立规范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有利益相关群体参与的政策评估机制，以便及时对相关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和困难做出反馈，并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将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访谈随笔】

邱华绒吾——“艾滋喇嘛”

尼玛顿珠¹

一.

“有些朋友叫我‘艾滋喇嘛’，但我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更不是什么喇嘛。我只是把防艾工作当作是一种修行而已。”

——邱华绒吾

“我要当一个假喇嘛”邱华绒吾对周扎活佛说……。

2006年，邱华绒吾从西北民族大学藏语系英语班毕业，因为英语专业的老师多为外教，所以老师们会在课上传授一些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包括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以及艾滋病、肺结核的防治之类的问题。那个时候，他就发现除了本专业的同学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对这些知识几乎都是一无所知。他想连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是如此，那基层百姓对于这些知识的了解肯定更少，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也有责任让百姓知道这些知识，但苦于没有办法，于是就找到了周扎活佛。

邱华觉得按照自己当时的能力肯定没有号召力，但他知道藏区老百姓都愿意听僧人的，所以他就说自己要当一个“假喇嘛”，去藏区各地化缘，宣讲卫生知识。之所以说是“假喇嘛”，是因为他觉得有很多僧人的规矩，他自己没有办法持守，而且他也不可能真的宣扬佛法，而是宣传

¹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公共卫生知识，所以邱华便萌生了当一个“假喇嘛”的想法。

周扎活佛当然否定了这个想法。藏族人虽然对僧人怀有虔敬之心，但是人们虔敬的对象，要么是有世系可循的转世大德，要么是修行圆满的大成就者，最次之也是那些能够给予百姓现实帮助的僧人。而这些条件邱华都不具备，即使他真的穿上了僧袍，也不可能完满当初的想法。不过周扎活佛建议邱华，可以通过高僧大德将这些知识传播给老百姓，这样效果应该更好。

于是邱华给慈诚罗珠堪布写了一封长达十五页的长信，信中提及了在藏区基层开展公共卫生知识和疾病防治宣传的重要性，尤其是宣传艾滋病防治宣传的迫切性，不过当时那封信却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虽然“假喇嘛”没有当成，也没有收到堪布的回复，不过却种下了一个因的种子，待日后条件完满，开花结果。

邱华一直放不下那封信，又找到一次机会给慈诚罗珠堪布打了一通电话，询问信件是否收到，写得是否妥当，堪布回答写得很好，但也没有明确答复。之后，在一次和堪布见面的场合，他提前准备好了那封信，因为担心堪布可能并没有来得及仔细阅读，然后在堪布面前从头到尾细细念了一遍。当时还有另一位来自青海热贡的仁波切在场，他们当时正在做一份面向藏区的藏语文杂志——མཚོ་ལོ་ལྔ་པ། (《高域》)，就当场邀请邱华负责社会栏目有关卫生、健康、医疗方面的内容，邱华欣然答应。杂志的发行量很大，每一期大概会印刷几万册，藏族老百姓第一次见到藏语文有关防艾的知识，应该就是通过这一本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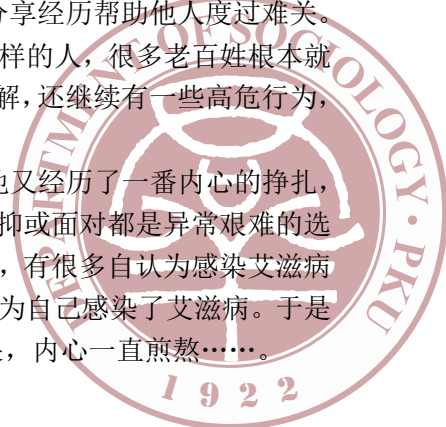
2006年，邱华绒吾加入温洛克工作，期间一直参与温洛克涉及基层公共卫生、医疗健康的项目。2006年的时候，与周扎活佛合作，他们在四川塔公培养了60名僧尼医生，负责卫生医疗知识的宣传与日常疾病的诊疗，这些医生到现在还在当地做相关的工作，其中一些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诊所，为老百姓看病，接受咨询，定期下乡巡诊，免费发放各类药品。因为僧尼属于宗教人士，更受百姓尊敬，因此宣传效果也比俗人宣讲更好。2009年的时候，在温洛克的资助下，邱华制作了藏文防艾宣传手册和康巴方言的防艾知识光盘，并且在甘孜州理塘培养了53名基层医生，专门进行了艾滋病知识的宣讲和艾滋病患者护理方面的培训。

如果说最初选择从事防艾相关工作是因为心中的爱心和责任感，那么2008年的经历直接影响了邱华让他能够更加坚定地继续防艾的道路。

2008年，邱华和甘孜州疾控中心的领导一同去云南考察学习艾滋病知识，通过那次学习他才知道，原来甘孜州就有艾滋病患者，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乡炉霍，有一些性工作工作者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那段时间，他们到吸毒人群中去，进入戒毒所、艾滋病康复中心，了解这些艾滋病人的生活，听他们的心路历程，使邱华更加感受到了这个疾病的可怕。这次的学习让他更加清楚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具体的症状，在学习回来之后，他就怀疑自己也感染了艾滋，因为邱华自己在以前也做过一些“不知分寸”的行为。他越想就越觉得可怕，也许是因为心理的恐惧，他开始腹泻、发烧、脸上冒痘，而这些恰好都是艾滋病前期的症状。他越来越害怕，但是也不敢做检测，希望晚一天知道答案，多一天开心的日子。

不过，那时候几乎是每天都活在阴影底下，他回想起在云南的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志愿者，他们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参加一些公益组织为他人现身说法，分享经历帮助他人度过难关。这些人成了支撑他的勇气，他决心和他们一样，因为在藏区太缺少这样的人，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有艾滋病这样的疾病，甚至有些人在感染艾滋病之后因为不了解，还继续有一些高危行为，他觉得现身说法倒是可以真正帮助一些人，所以下定决心去做检测。

但是做检测的决心还不够支撑到面对检测结果，结果出来之后，他又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拖了很多天不看检测结果，每一天都异常的漫长，对于他来说，逃避抑或面对都是异常艰难的选择，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面对。这些内心的煎熬是常人难以体会的，有很多自认为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因为了解艾滋病，也知道自己经历了高危行为，便会认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于是他们会不停地去各种不同的医院、机构检测，但是放弃面对检测结果，内心一直煎熬……。



那时邱华总觉得可以从外表的变化看出是否感染艾滋病毒，在去取检测结果的路上就始终注意医生和护士看自己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到检查医生那里，医生手头正在忙别的事情，看到他来，也只是简单地打了招呼，然后再低头写什么，当时他就觉得完了，肯定是感染了，医生是不想亲口告诉他，想写出来。就在医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对他都是漫长的煎熬。没想到等医生写完了，却从抽屉取出了一份结果，说没什么问题，可以回去了。

简单地被告知结果，却让邱华万分感谢，当时他就跑过去拥抱医生，还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他说：“当时感觉即使是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给了他一个人，也不会有这样的愉悦，这对他来说就像被告知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份难得的经验让他认识到，肯定有很多人和曾经的他一样，活在阴影当中，既不敢去做检测，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就希望他们能早点检测，能够早点开心，也没有想到去倡导艾滋病要早发现、早治疗。经历了活在阴影之中的痛楚、沉重与无助，体验了得知检测结果为阴性，仿佛感到了重生的狂喜，这使他生出了最简单的利他之心。

自此，他就不停地进行防艾的宣传，几乎是见到朋友就讲艾滋病，劝大家要预防、做检测，他就是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甚至有一次在一个好朋友的婚礼上，看到到场的人很多，邱华就希望能借这个机会为大家做一次宣传，朋友当然没有反对，但是讲完差点弄砸了婚礼。女方的父母听完之后就非常不高兴，大喜之日怎么可以讲这么晦气的东西，到场的来宾也都很诧异。那时候朋友都说他像一个传教士，每天遇到一个人就开始讲艾滋病，“艾滋喇嘛”的名号也开始传起来。“假喇嘛”没有当成，倒是真被冠上了“艾滋喇嘛”的称呼。

不过在当时，邱华的影响力并不大，他形容当时的工作是“单打独斗”。在工作单位搬到成都之后，邱华发现在成都有很多藏族病人来寻医问药，但是病人不懂汉语，医生不懂藏语，医患之间没有办法沟通，发生一些医疗事故也不懂得维权，邱华和几个朋友就成立了一个道义小组，免费为病患作翻译。刚开始的时候，需要帮助的人还比较少，慢慢地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懂汉语的藏族病人也来找他们，因为他们更加熟悉医院的程序，也知道哪些医生比较好。除此之外，还出现其他一些问题，道义小组的工作原则是一旦着手帮助一个病人，就要负责到底，因此志愿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护，再加之患者可能随时发生问题，不管白天夜晚都需要志愿者看护，团队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期间，甚至有一些女性志愿者还遭到病人或病人家属的骚扰，小组工作难以进行。之后小组调整方向，专门针对妇女和儿童进行救护帮助，但是求助者还是越来越多，完全没有办法顾及，最终就专门转向做艾滋病患者的救护，并在2010年成立了“红围巾艾心小组”。

当时这个小组申请参加了中国的全球基金项目，申请五十万元的工作经费，但最终只拿到了五万，不过小组还是拿到了环球基本项目的突出贡献奖。不过回想起那次项目的经历，邱华却是感慨万千。虽然最终是五万元的项目，但工作量却和五十万的项目是一模一样的，需要频繁地开会、写报告进行提交，占用了大量平时工作的时间：“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做，倒是需要天天开会、写报告”。再加上报销管理严格，项目很多实际支出没有办法报销，那个时候财务就让他们去开假的发票。邱华说：“刚开始去开假发票心里都会很紧张，就觉得自己是个人贩子，总担心被人发现，被人偷拍，但是做完这个项目，我真的是大摇大摆得去要发票，要多少钱的都不害羞、不害怕。想到这些，我就觉得不能这样了，再继续这样就会教坏我的志愿者，所以就跟志愿者说，以后再也不申请这样的项目了。”

虽然当时的工作规模还很小，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红围巾艾心小组”在成都武侯祠成立了十二个工作站，很多藏餐馆、小旅馆、小商店都是宣传点，他们将防艾的宣传册、安全套都免费放在这些地方。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不高，说：“是不是住了你们的旅店，就必须戴套！”之后，他们也掌握了方法，不故意推广，就把宣传册、安全套放在客人能看见的地方，发现有人悄悄地带走。当时所有这些宣传点都是义务性质的，没有任何费用，邱华就找了慈诚罗珠堪布专



门题词，然后冲印装裱放在这些义务的工作站中，包括现在可以在很多武侯祠的商店、旅馆看到的这个题词。

这一举动的效果远远好于金钱鼓励，大家都觉得能得到这个题词是一种荣誉，越来越多的商贩、店铺愿意加入到防艾的行列。之后，成都民宗局发现了这个事情，给予高度赞扬，并且还专门制作了印有“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发展促进会防艾宣传点”的牌匾挂在这些工作站中，邱华自己也因此获得了“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发展促进会防艾宣教中心副主任”的称号。

大概是在2012年12月，慈诚罗珠堪布和索达杰堪布开始着手去做有关藏区防艾的工作，邱华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自然而然地被邀请加入他们的工作。

二.

“以前藏区几乎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人知道艾滋病，老百姓不知道艾滋病是一个吃的东西还是别的；现在有一百个问题，就是因为老百姓知道了艾滋病是一个传染病。”

——邱华绒吾

诸如慈诚罗珠堪布和索达吉堪布这些高僧大德对于艾滋病的关注，几乎一下子改变了老百姓对于这一疾病的认识，也改变了老百姓对于邱华本人的看法。不过随着艾滋病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藏区百姓认识，形形色色的防艾组织和个人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摆在邱华眼前。“以前藏区几乎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人知道艾滋病，老百姓不知道艾滋是一个吃的东西还是别的；现在有一百个问题，就是因为老百姓知道了艾滋病是一个传染病，但是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和不会传播的行为。”

善的发心当然无可厚非，但是不恰当的善行会让那些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很多善良的人都认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不仅传染而且不可完全治愈，因此都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清楚这一疾病。但是对于疾病的认识不仅需要从生物物理的维度出发，对其生物基础、致病原因、疾病后果和疾病控制有精确的了解；其次也需要了解其社会的维度，了解疾病与健康、了解个人心理与社会文化对于疾病的认识。邱华说：“艾滋病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疾病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你要把这个艾滋病的问题放置好，就需要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去谈这些东西”。

尤其是在这一类传染病的宣传过程当中，有许多地方需要注意。因为艾滋的不可治愈性和极强的传染性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往往会使人对它的认识产生偏差，而当代社会对艾滋固有的偏见和歧视更是使得正确认识艾滋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个体智识的局限和生存境遇的差异，特别是各类专业知识的缺乏，使得藏区各类防艾的宣传出现许多问题，这正是邱华担心的。

比如一些僧人在讲艾滋病的问题时，会排斥性行为，将艾滋病感染者和吸毒人群、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和多性伴的人划为一类人，甚至有些人会鄙夷艾滋病感染者，带上自己的价值判断。还有一些僧人出于戒杀放生的考虑，告诫僧俗禁吃鸡鸭鱼肉等，因为里面含有艾滋病病毒（这一谣言本身来自内地，中国艾滋病防治网已经辟谣）。当邱华对这一谣言进行辟谣时，便遭到了一些人反对，说“你这么一辟谣，那么多生命就要死了，是造孽啊。”但是这样的谣言散布得多了，邱华就感觉到老百姓就对艾滋病的防治开始不关心了，因为连吃都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些医生和组织，为了让老百姓认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就用一些污秽不堪、令人心生厌恶甚至恐惧的图片或者视频来进行宣传，而其中一些材料甚至根本就不是艾滋病的病症。这种宣传的目的，只是为了通过视觉的震撼让人心生恐惧，产生防艾的意识。但是这样的宣传不仅加剧了人们对于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误解，还造成了许多艾滋病患者的恐慌，很多感染者非常担心，他们找到邱华，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些患者本已经饱受病痛折磨，却还要再经历一番痛苦，承受更多异样的目光。

正是因为这样，邱华自己对于从事艾滋病防治的志愿者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亲身接触过艾滋病感染者，否则就没有资格为别人宣讲艾滋病的知识。有很多朋友觉得这样会出问题，万一志愿者意外感染了艾滋病，邱华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但这是他坚持的基本原则。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医，就因为有一个对艾滋病一知半解的医生对他随口说了一句：“你可能得了艾滋病”，这个小伙子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饱受煎熬，又不敢去检测。他说每天都在思考如何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想了无数种，但是每次有这样的念头时，就会想到自小养育自己的叔叔。最终在邱华的帮助下去检测，发现这个小伙子其实根本没有感染。

对于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的医生，没有关怀过一个艾滋病人的志愿者和完全不了解艾滋病人世界却大谈特谈艾滋病防治的非感染者来说，他们根本无法体会被定义为“艾滋病”患者感受的痛苦，也很难具备最基本的同理心，而往往就是这些微不足道、不曾在意的言辞和行为，会给另一方造成伤害。因此现在邱华在任何场合进行宣讲时都非常小心，注意分寸，因为他相信在听众中肯定是有感染者、有那么一些人在期待着、盼望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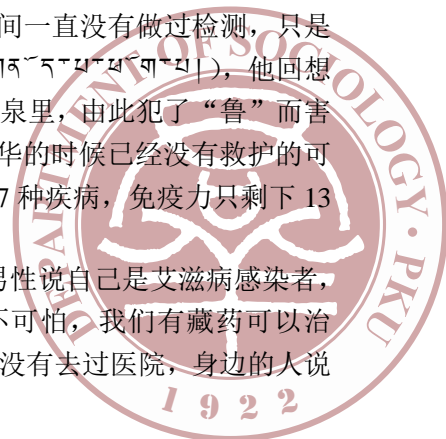
不恰当的宣传还只是乱象中的小部分，由于藏区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只是对艾滋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更是让一些人心怀不轨，于是出现了一些所谓可以治疗艾滋病的“医生”、“医院”和“药”。有一些“医生”到乡村每家每户去发药，说这些药是由慈诚罗珠堪布和索达杰堪布制造的，包治百病，甚至是艾滋病，百姓对此当然深信不疑。他们还宣称在药物采摘和药物制作过程当中，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他们希望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所以可以随喜捐赠，拯救更多的人，这样一来反而可以获利更多。

还有一位藏医宣称自己生产了可以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甚至和内地的某些机构在内地成立了医院。邱华曾经质疑他，问他们如何进行药物的实验，如何证明他的药能够治愈艾滋病？他说自己和学生签订协议，学生来试吃生产的药品。邱华就问，难道你是在学生身上先注入艾滋病病毒，然后再测试药物的有效性？他回答，他只是测试这些药物是否有副作用而已！简直荒谬！因为邱华在网上辟谣，现在这位藏医的药鲜有人问津，这位医生还曾经威胁邱华：说他自己之前收养了七十多名孤儿，现在因为药卖不出，没有办法继续抚养，这是谁的责任？而关于这位藏医研发出药物、建立医院的报导，至今还被大量的自媒体平台 and 报纸、主流媒体不加甄别地宣传。

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制作了一种护身符，老百姓相信这种护身符的力量，相信戴上之后就不会感染艾滋病，于是就有人批量制作这种护身符，售价甚至高达两万元一个。每当邱华反对这些事情、进行辟谣，告诉大家现在艾滋病还不能被根本治愈时，就会遭到很多人的攻击，说他不支持藏医，对藏医和宗教心存不敬，嫉妒别人做出了好的成果。对于这些非难，邱华并不在意，反倒是深深地担忧和焦虑，他说他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医生救过多少艾滋病人，但是他知道因为这些所谓的医生和谣言，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

邱华目前正在帮助一个牧区的女孩子，她感染了艾滋病，丈夫也是患者。2014年丈夫找到邱华，当时做检查，32岁丈夫的免疫力只剩下6个了。人的免疫力是可以计算的，健康状态下一般是800-1200左右，得了艾滋病以后会以大约每年100左右的速度下降，如果期间感染了其他疾病则会加速下降，由此可以推算至少有5、6年的病史。但是期间一直没有做过检测，只是有一次去找喇嘛打卦说可能是侵犯了龙王，害了“鲁”病（ཀླུ་ལྷ་གནམ་འཕྲུལ་གྲུབ།），他回想可能是自己有一次把一头被狼咬死的牦牛拖回家，途中有血滴到了水泉里，由此犯了“鲁”而害了病。于是他就进行了祭祀，觉得有所好转就一直没有关心，找到邱华的时候已经没有救护的可能了。到了2015年，这个女孩子来找邱华，年仅27岁的她全身有27种疾病，免疫力只剩下13个。

女孩子亲口告诉邱华，她被七个藏族牧民强奸，她明明告诉那些男性说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跟她发生性关系会感染艾滋病，但是这些人全不在乎，说艾滋病不可怕，我们有藏药可以治疗……。女孩子的姐姐在她找到邱华的前一个月就去世了，她从来都没有去过医院，身边的人说



她有咳嗽的症状，可能是肺结核，但是百分之八十的艾滋病患者都患有肺结核，很多感染者在没有出现艾滋病的症状之前会因为肝炎、肺结核、肾脏、心脏的问题去世。

邱华说这些就是他的数据，因为那些谣言和未经思索、不负责任的言论，有些人开始对艾滋病不在乎，对危险的行为漠不关心。因此，现在邱华的工作已经不是在简单地宣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而是在如此乱象之中平衡、斗争、坚持。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你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是想退也没有退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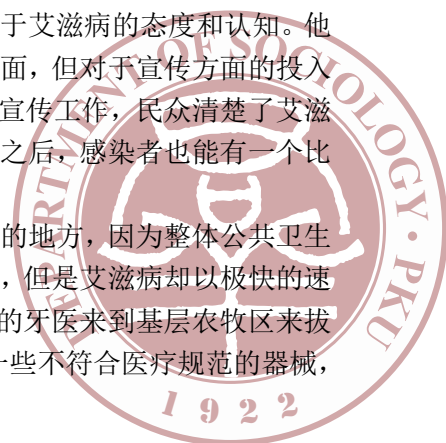
三.

做艾滋病防治的工作有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首先就是人们面对这一疾病而产生的天然、本能的恐惧。就在他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他自己也会害怕，虽然清楚地知道艾滋病传染的病理机制，但是当自己切身去面对一个感染者时，心中还是会有不安、担忧甚至是恐惧，这样一种心态也许是因为所习得的知识还没有完全地内化成自己不会在意的惯习。当时他经常做梦，有时候梦到自己感染，有时候感染的是自己的爱人，最难受的一次是梦到两个女儿被感染，在梦里他就哭得一塌糊涂，醒来发现自己还是泣不成声，难受至极，那时真的是难有安眠之夜。慈诚罗珠堪布还开玩笑跟邱华说，这是典型的恐艾症（艾滋病恐惧症），多年工作的经验锻炼的不纯粹是技艺还有心智，现在虽然已经不会有这种心态了，但还是会有一些事情会让自己后怕。

有一次救助一位因吸毒感染的艾滋病患者，起初并不确定患有艾滋病，以为只是淋巴结肿大，便希望能够手术治疗取出淋巴结。在医院取出部分组织检查病情是恶性还是良性时，才发现是因为艾滋病引起的病症，之后便被医院拒诊，也不允许待在医院。因为患者感染了艾滋病，免疫力变得低下，身体很多患处没有办法愈合，伤情越来越严重，甚至开始溃烂流脓，但也别无他法。有一次邱华和这位患者一起乘坐三轮车去疾控中心取药，不料发生车祸，撞上了一辆车，虽然没有血液溅到眼睛这些地方，但因为事先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难免担心有感染的风险。现在，邱华已经能够很自然的和艾滋病人相处，不会担心自己被感染，但他相信有一天他肯定会感染肺结核，他说都对此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因为肺结核会通过空气传播。

作为一名专业的志愿者，在与艾滋病人相处时都需要经历恐惧的过程，那么初次面对艾滋病的普通群众更是免不了如此，而且他们的恐惧会持续更长时间。在许多老百姓看来，艾滋病就是病魔，你不去提及它、招惹他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只要天天嘴上挂着它，那就会出现问題。所以在刚开始做防艾的宣传时，很多百姓并不乐意去听、去讲、去面对。有些老百姓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业”（ལས་ལྷན་པོ།），如果自己的命中有这样的“业”，那是怎么躲也是躲不掉的；如果没有，那就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感染。虽然在诸如慈诚罗珠堪布和索达吉堪布等高僧大德的推动之下，民众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理解有所改观，但是真要能够完全消除对于艾滋病的恐惧，能够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艾滋病人，这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而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如何能够客观和清晰地认识这个疾病，以一个相对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防艾志愿者所做工作不仅仅是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知识，更是改变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认知。他去北京学习的时候，发现中国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但对于宣传方面的投入却非常少，他觉得这样一种状况需要改变。他的理念是，要是做好了宣传工作，民众清楚了艾滋病传染的途径和有效的预防措施，同时也对艾滋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感染者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空间，否则整体社会只会是对艾滋病患者越来越排斥。

邱华的防艾工作落实到了藏区的最基层，基层是最需要进行宣传的地方，因为整体公共卫生医疗设施的不完备以及公共卫生知识的缺乏，民众对艾滋病一知半解，但是艾滋病却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了基层农牧区，并且以各种途径传播。有一些没有营业执照的牙医来到基层农牧区来拔牙、镶牙，其实都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野医生”，使用都是一些不符合医疗规范的器械，



而且所有器械都不经过任何形式的消毒，邱华曾经见到有“医生”拿着修理摩托车的工具给人拔牙。还有一些医生拿着不清楚什么成分的药，在挖虫草的季节到山上，说注射这个针剂就可以治疗梅毒，没有梅毒的人也可以预防，有些人知道梅毒的危害，甚至是拖家带口地来打这种针，但是这些针头也是从来不消毒也不更换的。这些医生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很多人感染了疾病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些性工作者在挖虫草的季节也到山上去，以虫草计价，比如是一根大的虫草可以提供两次服务，再加上一根，可以不使用安全套……。

除此之外，一些基层的医院在注射皮试针的时候不消毒，一些藏医在针灸、放血的时候不消毒，有一次他甚至见过一个医生直接透过衣服给人针灸。邱华目前救助过的年纪最大的一位艾滋病感染者，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这样年纪的老人根本不可能和别人发生性关系，而是因为其他的高危行为被感染。但是，每当邱华告诫这些医生需要对医疗器具消毒，需要做好安全措施时，就会有人以“传统就是如此”的借口来反驳。虽然传统是如此，可是时代毕竟在变化，而且艾滋本来就是晚近的疾病。因此他也被很多人视为“恶见者”（ལྷ་འཕྱོགས་པ་པོ།），认为他不尊重传统和宗教。但是他还是必须去反对这些不当的行为，因为他将这一工作视为己任。不过，他现在讲话小心了很多，因为他感受到一旦被人贴上了标签，即使你讲的是真理，也会因为偏见而不被人们接受，但他唯一的希望，是能有更多的人接受防艾的知识。

为了能够扩大防艾知识的宣传面，邱华从 2013 年开始“防艾万里行”，去到基层村落、去寺庙、去牧区、去挖虫草的山上。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他做的事几乎是带有一点欺骗的性质。他去挖虫草的山上，因为老百姓不愿意听有关艾滋病内容，他就放电影，从下午开始摆好幕布、放音乐，然后到了晚上，各地挖虫草的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他就开始放电影，在电影最精彩的时候就像插播广告一样停下来，为大家讲艾滋病的知识。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万里行”，第一年只走了一千一百多公里，去了两个省、三个自治州和五个县。在第二年的时候，他遇到一些阻碍，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找了一位新华社的朋友和自己一起去，因此各地政府基本上是一路绿灯，还请他们报导各地防艾的工作。当时，他还有机会给玉树州全州疾控中心的人讲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他说由自己一个草根组织的人给政府疾控中心做宣讲，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到了 2015 年，事情就变得顺利多了，他去到三个省、七个自治州、十八个县，五十天的时间内做了五十六期宣讲，总里程达到九千八百多公里。

除此之外，他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运营藏区防艾小组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平台有几万人关注，每天关注的人数也在增长，除非是下到基层实在没有网络，他每天都坚持推送有关艾滋、卫生方面的知识。他自己的个人信息也都公开了，每天都有三、四十人添加他为好友，问他形形色色的问题，他甚至对所有藏族人通常爱问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发现常问的问题不超过 53 个，他在手机上给每个问题设置了快捷回复，只要有人提问，他就能以最快的方式进行回复。

现在他也不担心没有地方宣讲，除了公众平台的宣传，他还经常被邀请至一些微信群开讲座，有的群小，可能有十几个人，有的大群会有上百人，所以只要有网络，他都可以做宣讲。在微信上宣讲，他基本上可以将一句话精确控制在 55 秒左右，并且一句话讲清楚一个问题，基本不赘述。他说这都是练出来的，刚开始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是之后发现有人用他的语音在网上宣传，自己再去听，就发现要么就是一句话里有很多无用的信息，要么就是一句话里没有把一个问题讲清楚，之后他就不停练习，有时候为了发送一句话，甚至要练习半个多小时。每次在微信上做完宣讲，他就会继续回答各类问题，因此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觉得自己每天的时间不够用，基本上都是不停地在做防艾的工作，防艾已然成为生活的核心。

四.

邱华的生活当然不全是艾滋病防治，在 2008 年 7 月份的时候，正值甘孜州州庆，邱华发现



了很多双语的商店标牌之中有错别字，他一一照相，一共收集了 318 个错别字，并进行修改。修改的时候遵循了两种方法，一种是音译、一种是意译，然后将所有的错误内容都重新改正之后，弄成一个小册子，然后给甘孜州州长和康定县县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内容大致如此：

我是一个藏族的大学生，正值甘孜州州庆，我作为甘孜州的一个大学生，想献一个礼物，但是其他方面我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在甘孜州的店铺标牌中发现有很多错别字。这些文字就像人的眼睛，汉文是一个眼睛，藏文是另一个眼睛，如果一个眼睛瞎了，别人看起来都不好看，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小小的举动，在国内外游客都来参加我们州庆的时候，有一个好的面容展现给世界各个地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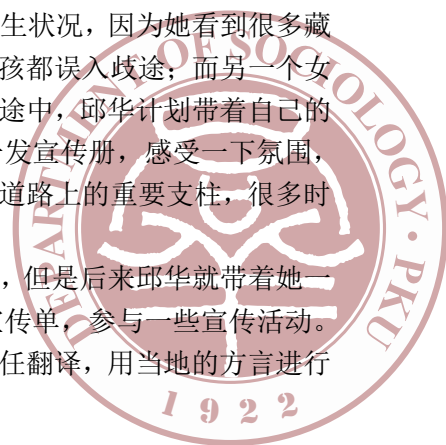
当时早上把这信从邮局发出去之后，中午甘孜州康定县县委书记就电话联系了邱华，肯定了他的提议，并让他负责整个修改方面的工作。中午十二点得到回应之后，他们就立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邀请了编译局、宗教局、包括四川省藏文学校的老师，到晚上两点钟，就改了两百四十多个店牌，全部都改好了。在那个时候甘孜州州庆请来了很多老师，但是在面对这些翻译的错误面前，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师们却没有一个人开口，邱华提议说，藏语和汉语的文字大小要一样，在翻译上要遵循藏语表述的语法习惯，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人开口，所以最后虽然做了修改，但效果并没有邱华想象的那么好，不过这件事倒是在甘孜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甘孜日报》还邀请邱华关于藏汉标牌的翻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在对文章作者进行介绍时，他们就把邱华称为“艾滋喇嘛”。

在大学期间和刚毕业的时候，邱华称自己算是一个“比较不听话的人”，因为会经常写一些批判传统、现状甚至是反对索达吉堪布和慈诚罗珠堪布言论的文章。但是自从开始参加防艾的工作之后，他的很多观点都发生了改观，在过去他曾经对宗教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但是现在，他说宗教对于这些弱势群体和感染者来说，是唯一的良药。来找他们求助的病人，往往是藏区最贫困、最缺乏语言交流能力、处于整个社会阶层最底层的那群人。在死亡临近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需求，只希望能自己能有一个好的来世，能够解脱，这是他们那时唯一的寄托，如果破坏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唯一信念，那真的是一种罪过。由此，邱华也开始理解慈诚罗珠堪布这些高僧大德的一些言行，知道其中自有道理，过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自己缺乏了解而导致误会。现在他身边既有年轻的、持先锋观念的朋友，也有很多老一辈的高僧大德的朋友。他说现在藏区的很多人、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什么想法就开始讲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思想就开始讲自己的见地，还没有见地就开始划清立场。而工作了那么多年、见识了那么多朋友，他反而觉得自己连想法都没有，更不敢有立场。这样，反而能让他看清楚哪些人是真正善良的人，他也愿意与他们为伍。

五.

邱华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正在上初中，儿子还在上幼儿园。谈及理想，两个女儿都希望从事与公益的活动，一个希望能改善藏族儿童的权益和卫生状况，因为她看到很多藏族的孩子被老师打骂、被家长体罚，甚至是被社会抛弃，由此很多小孩都误入歧途；而另一个女儿则希望能从事与妇女权益相关的工作。而在今年的“防艾万里行”途中，邱华计划带着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一起进行宣传，虽然儿子很小，还不识字，但是让他发一发宣传册，感受一下氛围，也能够让他学会帮助别人，体验和理解其中的意义。家庭是邱华防艾道路上的重要支柱，很多时候，邱华是带着全家人一起做防艾宣传。

刚开始的时候，邱华的爱人还不能理解他所做的防艾工作的意义，但是后来邱华就带着她一起去做相关防艾的工作，一起参加“防艾万里行”，让她发放一些宣传单，参与一些宣传活动。邱华爱人的故乡是木雅地区，邱华不通当地的语言，就让她的爱人担任翻译，用当地的方言进行



讲解，让她也参与防艾的宣传，了解防艾宣传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地，她了解到了邱华参加防艾工作的意义，也给了他许多切实的帮助。

邱华在成都买了一个五十三平米的房子，位置就在武侯区疾控中心对面，之所选择这里，就是觉得可以方便之后开展的工作。邱华每天上班之后，如果有人求助要做检测，他就会让爱人帮忙，爱人也很乐意，就会帮忙检测，告知结果。每当在告知对方并未感染艾滋病时，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而求助的人也欣喜异常、分外感激。但是有一次，一位求助者被确诊感染，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已经感染的事实，当邱华赶到的时候，发现两个人都哭得一塌糊涂，他的爱人比真正的感染者还要害怕，在那边发抖。邱华于是也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让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妻子去参加做救助，要告知对方检测的结果是阳性，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而这更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一个没有经受过专业训练、不懂得如何慰藉的人反而会让感染者受到更多伤害。疾控中心检测的楼层是 22 层，邱华说，当时最怕的就是他爱人在一边哭哭啼啼，如果感染者万一跳楼轻生，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自此之后，他就很少再让爱人做相关的工作了，即使一定要帮人检测，只有在检测出阴性时，才让妻子告诉对方结果，否则，都是等邱华来了之后，再将结果告诉感染者。因为成都没有专门的志愿者从事陪人检测、陪感染者拿药的工作，所以邱华也实在没有办法。

现在，邱华每天晚上都要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有关防艾的消息，并且还要不时地给一些微信群进行讲座。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只要女儿儿子在身边，他都会拉着他们在旁边一起听他的讲座，帮助他做笔记，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引导，耳濡目染，孩子们也能学到很多。他回忆起之前收集西藏民间歌谣、谚语、俗语、谜语的时候，他需要和很多农牧民联系，打电话，然后进行录音收集，这个过程，他的两个女儿都看在眼里。就在有一次她们放假时候，一个女儿收集了四十几个民间歌谣、另一个则是收集了很多谚语，这些都是她们自己收集的，因为完全是按照方言做的记录，所以里面有很多错别字，根本不符合藏文的文法标准，但是邱华觉得特别美，将这些资料留存至今。

公益者利众、利众者心善，利众并不需要完全舍己，现在防艾就是邱华的生活，每天不管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他基本上都做的是防艾有关的事情，而能够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共事，则是防艾过程最大的幸福。

2016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13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